

阿拉提·阿斯木

■对 话

你可以忘记带水和馍,但是不能忘记带着爱

——访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

□毕 亮

毕 亮:阿拉提老师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有哪些作家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阿拉提·阿斯木:毕亮兄好。此前应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的邀请,跑了一趟深圳,在那里,和春天的故事一起,看到了激动人心的春暖花开。我写小说就是从“春暖花开”开始的。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木沙江老汉》,故事来自我知青岁月里的生活,写在大田里看瓜老汉护卫集体财产的生活。故事语言都十分简单,发表在《伊犁日报》副刊上的,编辑是史文老师。

那时候喜欢读书,读过当时能找到的一些小说,比如《敌后武工队》《艳阳天》《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大学》《在人间》《追忆似水年华》《堂吉珂德》等等。

后来到了有书看的时代,就喜欢上了肖洛霍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也读了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再后来读了国外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博尔赫斯、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读了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和艾青、郭小川、公刘、舒婷、海子的诗歌,也读了一些评论家和哲学家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专著。

我比较喜欢王蒙的小说,喜欢他的风格和文学毅力。长篇经典方面,我喜欢《红楼梦》,认为《静静的顿河》和《红楼梦》是值得我研读一生的小说。

毕 亮:您早期的创作,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其中主要作品都收在小说集《阳光如诉》《醒来的和睡着的》中。其中,您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哪几篇?您认为自己早期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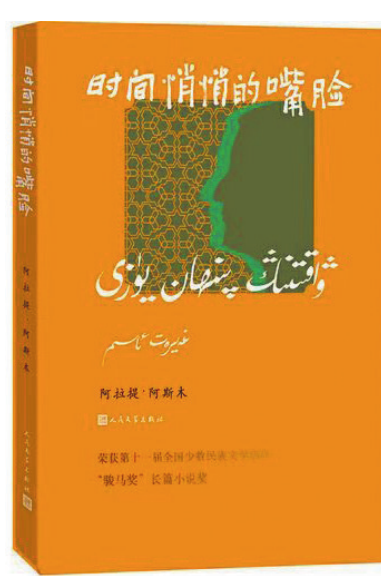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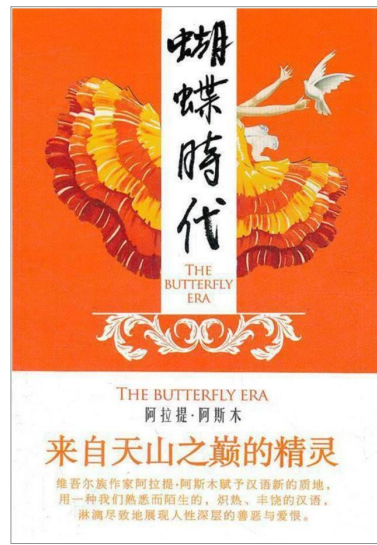
阿拉提·阿斯木: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阶段性的认识,一段时间过去后再拿出来看,感觉很幼稚。但会有几篇能继续看的东西,比如小说《洁白的小轿车》《帕丽达穆》《飓风》《金项链》《一条旧地毯》等,现在看着还是喜欢,感觉比较纯真,也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纯洁,是我早期作品的一个特点,有一种炉火般纯真的东西在里面。后来收入《蝴蝶时代》集子里的小说,在写法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中篇小说《阿瓦古丽》《玛穆提》《蝴蝶时代》《岁月的穗穗》《其满》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作品。

毕 亮:您著有长篇小说“时间三部曲”《时间悄悄的嘴唇》《时间的孩子们》《时间的玫瑰》,在这些作品中,“时间”是名字,也是动词,还是形容词。通过“时间”这个重要的意象,来表现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精神状态。您可以谈谈它们的创作过程和您想表达的想法吗?

阿拉提·阿斯木:我喜欢时间。躺着也好,闯荡瞎忙也好,时间都是我们不收费的老师,和太阳月亮是一个村里的。我对“时间”用得比较活泛。但是总的来讲,在时间语重心长的照耀下,生活在前进,民众的生存条件在逐年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能力得到发展和提高。要在时代的大潮里提升我们的适应能力,做一个有能力发展自己、睁眼看世界、回报父母感恩社会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有现代意识的人。

这些理念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关于新时代新机遇、新人新面貌的营养和启示。时代在发展,各族人民生活和睦,民间生活也是互通有无,于是也很自然地形成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交往,美美与共,走出了我们的好生活。物质和精神的变化,也为我们创作小说人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生生的素材。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就会有一种写小说的想法,反复琢磨题材价值,设置构思,选择基调和氛围,全身心地完成它,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锁在学习的课堂里,始终全面思索自己的作品,拷问自己的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落实学习和提高,保持一种积极的、自然的创作状态和心理需求,热爱生活,热爱小说。我要表达的是,生活是复杂的,行走在路上,你可以忘记带水和馍,但是不能忘记带着爱。带着爱,寻找你的理想、你的美学和你的价值,用爱战胜迷茫、修复理想,这个过程落在纸上,就是最好的小说。

毕 亮:在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里,您写了“翻译”这个行当和“翻译家”这个角色。这样的人物设置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我们知道,您本人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请您谈谈汉文学互译的现状、意义和发展趋势。

阿拉提·阿斯木: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是我思考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作品,主要是有意识地给自己设置了一些写作的难度,也就是写作的那种陌生感,需要突破一些东西。新疆是多民族地区,翻译工作很重要,多年来我就想写一部反映翻译工作和翻译家生活的小说,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大批翻译工作者在这个战线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解放初期,众多翻译家们把大量材料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方便了众多民族干部的学习和工作,在公文、学习材料的翻译,重要的口译工作等方面默默奉献,在社会上很有威望,老百姓非常憧憬这种“两个舌头两种笔”的翻译家;另一方面,一些有一定成就的翻译工作者,一生也翻译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方面,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优秀的精神食粮。

这两方面的工作我是比较熟悉的,我的专业是翻译,十分喜欢这项工作。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克服各方面的困难,翻译了众多中外文学名著,在促进文化交流、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青年们学习汉语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大家认可,称他们是献身文学翻译工作的无名英雄。比如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能量,翻译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四大名著、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也有《红岩》等红色经典作品,为年轻翻译家做出榜样。我和许多这样的翻译家们生活在一起,十分佩服他们的翻译水平和献身精神,于是岁月流逝,这些东西在我的笔下变成了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倾注了我对这些前辈的敬意。

新疆汉文学互译最早是翻译家们自己选择各个民族的优秀作品来翻译介绍,后来自治区党委十分关心这项工作,宣传部安排资金,每年挑选优秀作品互译,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我们当下的情况来看,我们非常需要当下优秀文学作品的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供各民族的学生和青年人学习,从而帮助青年作家们在双语创作的路子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两支笔,多角度,立足家乡,放眼世界,磨炼自己,有大格局,培养自己的远大志向,在开放的新时代,做一个心胸博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选择一种健康的道路前行,不负韶华。

毕 亮:您近年来的作品,诸如《夜莺歌唱黎明》

《他人的篝火》等长篇小说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比较多,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汉语成语、古人名言,您又通过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进行了转换,这在您以前的作品以及很多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并不常见。这是您近些年来主动学习、阅读的结果吗?

阿拉提·阿斯木:生活在多民族地区的作家学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来充实自己,而后把它们运用在自己的作品里。在这个过程中结合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出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探索一条新的方法,是少数民族作家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面向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历史上出现的愉悦人心、鼓舞民心、歌唱生活、热爱生活的优秀作品,结合我们今天的生活,写出真正有温度、有逻辑、有希望的作品,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从远古到今天,影响我们的是这些文学作品带来的光荣和爱。牢牢地抓住爱,爱我们的家园,爱我们的父母,爱哺育我们成长、呵护我们创造功绩的祖国母亲,爱我们的理想和光荣,爱我们今天的时代,在精神面貌上,打牢我们的基础。而后,我们就会坐下来认真学习,研究出好作品的路径,创作一种有爱的、创造爱的、崇尚爱的作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特长——独特的写作方法、题材优势、多种语言的便捷等。

我的写作,特别是在不同语言间转换运用的过程,是非常滋润的。那种不同词语和约定俗成的语言力量,在新的转换里,给我非常温热激动的语言感受,像一个少年突然在没有期盼过的一个长者手里得到了压岁钱那样兴奋,因而我十分热爱语言独特的力量。我认为,重视这种转换,也是面向新时代文学创作的要求,落实一种开放性的写作,面向美好未来的一种写作。简单地说,就是学习型的写作,在我们旧有的经验上,充实新时代的要求,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毕 亮:作为一名双语作家,您的创作以小说为主,近年来尤其在长篇小说上用力甚深,评论家、读者对您的杂糅多民族思维的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很感兴趣,评价也甚高。您对自己的文学语言是怎么看待的?

阿拉提·阿斯木:实际上,是语言帮助我们一代代走到了今天。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感谢过语言。实际上,我们是诞生在欢欣鼓舞的语言摇篮里的,等待我们的是甘甜的母乳,而后是最好的牛奶和羊奶这些精美的营养品,但我们往往不知道这是依靠语言的力量才得来的前定福分。而后,我们能从困境中走出来,也是依靠语言的拯救和语言的正道召唤。也就是说,喜欢随意张口以后,我们忽略了隐藏在那些朴素的语言宝藏里的艺术元素,也就是文学语言,甚至那种能让人飘起来的语言,也是我们鲜花盛开的岁月记忆。我感觉我们欠了语言一些什么东西。在我们没有及时感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语言累了。因为我们在约定俗成的桎梏下,不敢相互间搭配不同性质的语言,句号不能当作逗号,动词不能作形容词。

实际上,语言已经太累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感觉到语言的苦闷。前辈们在不太遥远的时代发现问题的时候,不断变革文言文,在时间的

摧枯拉朽之下,文言文又变成了现代汉语。那么今天,我们怎样才能让哺育我们的文学语言继续拥有崭新的风采呢?怎样让这些语言再高兴一点、再活跃一点、再潇洒一回、再轻捷一些呢?

我想,应该允许它们走动。走出去再回来,有可能在它们回来的路上,会看到另一种时间敬献给它们的精美的小红花。在多元文化的花园里,要学会激活那些实际上是愉悦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阅读兴奋的语言关怀和陌生的语言启示。一种新的陌生的语言组合之所以存在,蕴含一种可能性,是因为语言在新的光明灿烂里,也想给天下的繁华敬献自己的点滴爱心。因为它们知道,人类祖祖辈辈砥砺前行、繁衍生息,是因为他们有爱,并且抓住了这个爱,把爱的绳结拴在了他们子嗣的灵魂里。敬畏语言,去发现它灵魂深处要赋予我们的阳光灿烂,和它们交朋友,拥抱它们,感谢它们……这也是我们平静的光荣和幸福。

毕 亮:作为一名创作生涯近50年的少数民族作家,从之前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到后来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您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您得过骏马奖,后来也当过评委,可以说您和骏马奖渊源甚深,可以谈谈您和骏马奖的关系吗?

阿拉提·阿斯木:我觉得自己是在骏马奖的鼓舞下走到今天的一个作家。在写作的初期,能有这么一种鼓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重生感觉。1985年,我的小说《醒来的和睡着的》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北京的领奖台上,王蒙老师用圆熟的维吾尔语祝贺我,那个时候我特别激动,心里默默地坚定了要把小说创作进行到底的决心。

无论工作有什么变动,我都没有忘记用小说温暖我的文学心,从长辈们那里得到的教诲是,一个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本职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你才能学会运用业余时间,成为一个好作家。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而我始终摆正工作和自己业余创作的关系,没有因为要写小说影响工作,而是积极地做好我的工作,甚至在很多时候都是超负荷完成工作任务,严格要求自己。后来到伊犁州文联,也根据有关要求,积极开展向有关部门推荐参加评选“骏马奖”作品的工作,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在担任骏马奖评委期间,严格按照要求阅读作品,实事求是地提出审阅意见,保证了此项工作的健康开展。2016年,我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唇》荣获第十一届骏马奖,我非常高兴,感觉自己没有偏离文学创作的方向,更加坚定了我的文学信念,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感谢文学给我的人生增添的异彩。于是我写了一篇《我们时代的骏马奖》的文章,阐述了骏马奖给我们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的鼓励,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起到的积极、独特的作用,内心里真诚地感谢骏马奖的鼓励。

毕 亮:曾经听您说过,年纪大了后反而更喜欢听母亲和她的老邻居们聊天。您是在寻找创作素材、积累生活,还是从他们身上找寻那种老伊犁的氛围?我感觉这种“聊天”的收获在2021年出版的《夜莺歌唱黎明》中有所体现。您

正在写的长篇新作,也是“聊天”的收获吗?

阿拉提·阿斯木:我认为聊天是在比较自然的状态里收获人生经验和人性航标的一种逻辑串门,生活中我们似乎都是这方面的常客,我们的精神生活离不开往昔记忆的验证和盘点。喜欢聊天是我最初顽固的一种元素,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我的脸上看不到这种温度,可能是因为我有一张比较冷峻的面孔,不会经营笑脸。

在聊天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看得见看不见的人心,能从词语的晶亮和磊落的那一面,发现人性的亮堂,这种永恒的人间温暖和语言关怀,给我温暖和力量,给我不用交学费的自信,这是我内心充实的来源。喜欢和母亲闲聊,主要是梳理我的童年记忆,见证母亲对往事的基本态度,在波浪翻滚的日子里,整理我成长路上的卡片,正视颓废和尴尬,修正自己的灵魂,感谢从一餐餐中派生出来的乐趣和欣慰。

我在长篇小说《夜莺歌唱黎明》中也是运用聊天的写法,用一种比较写实的手法,推动故事情节,通过一些比较独特的细节安排,铸造人物个性特点,从而展示岁月匆匆,人在岁月中经历的坎坷,看似是一种不幸,实际是生活所需要的学费。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理想中,也伴随了时间考验我们的学费。如果小说里不写代价、不写眼泪,不写学费和生活花园所需要的肥料,我们说不清楚朵朵鲜花的迷人醉人。

目前我正在写一部反映一家人疫情期间生活百态的长篇小说,题目暂定为《飘移的烟火》,写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之间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写了特殊时期亲情之间一些微妙的心理纠结。可以用一句俗语来概括:“一个母亲可以养十个孩子,而十个孩子养不住一个母亲。”实际上我的主题是爱,当自私和贪婪把我们拐进阴暗的死胡同里的时候,最终拯救我们的东西是爱。因为爱和太阳是孪生姐妹,远古的时候也是一家人。它们的口碑是免费拯救无耻和贪婪,把陷入牲口山谷的人一个个拉出来,在他们的耳根下说过悄悄话,和他们的狼狈一起,交给他们的母亲,交给闪闪发光的良心,交给黎明的光速,成全他们在天空的胸襟里,用最干净的水洗心革面,跟着生活往前走。实际就是孩子们绕了一个大大小小的圈圈,找到了母亲在他们出生的时候给他们的爱。生活有的时候不叹气,但是她不会永远沉默。

毕 亮:对现在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尤其青年双语作家的创作,您有什么建议,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阿拉提·阿斯木:青年作家是我们文学战线上的接班人,因而他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光荣。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在满腔热情带着初心出发的时候,要设计好自己的将来,自己必须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人民认可的艺术家。

要有创造信念,任何时候都要坚定自己,把文学创作进行到底。那么,在学习文学创作的同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要在心灵深处,牢固地树立爱党爱国的远大志向,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支持,我们将一事无成。而后要坚持学习,牺牲自己的娱乐时间去学习,在任何时代,是学习在成就一个作家,因为我们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至理名言。比如我们熟悉的人民艺术家王蒙,今年89岁了,还在努力,还在实践,还在发表长篇小说,是我们的榜样。先生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文学,没有放弃写作。他写各种体裁的作品,面对逆境,面对不顺,没有怨言,而是通过文学的力量,在没有希望的地方找到了希望,最后成就了自己一生的文学事业。

王蒙老师有这样一段话:“因为有文学,记忆不会衰老,生活不会平淡,感情不会遗忘,话语仍然鲜活,思维仍然蹭蹭蹭,童心仍然蹦蹦跳跳,诗意仍然在意在胸,日子仍然晶晶亮,我可以告诉读者,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另一个备用题名,叫作《亮晶晶的日子》。”

我借用这段话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预祝好多年以后,大家都会有一个亮晶晶的美好未来,把自己的文学之心,献给我们尊敬的读者,献给养育我们成长的人民和可爱的祖国。

■声 音

有没有一种独属于小说的语言

□马笑泉(回族)

者看到的就是小说的语言,同理,当诗歌在语言中显形时,阅读者看到的就是诗歌的语言,更准确地说,阅读者看到的是作品的全体。所以,当思考小说语言的独属性时,其实是在探究小说本身的独特性。

小说语言当然是在一种虚构状态中展开,或者以虚构为前提。虚构性质或许可以视为它的本质属性。相对于同样具备虚构性质的戏剧语言,它在人物的动作和对话之外,还有更多更大的叙事空间可以自由驰骋。诗歌和散文当然可以叙事,但诗歌语言无法像小说语言那样能在绵延的状态中

将叙事的皱褶充分打开还能再度(甚至几度)折叠,散文语言则无法像小说语言那样,在虚构的允许下明目张胆地不断塑造人物、制造事件。散文当然也可以虚构,但它的虚构是有限的,小说则通过虚构创造了一个更真实、更生动的世界。在这种由虚拟的过程中,小说语言释放出了无与伦比的活力和创造性。是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语言。诗歌语言或许更凝练、更锋利,但在广度和力度上,尚不能与富有创造性的小说语言相媲美。这种创造性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飞扬的想象力作支撑。缺乏洞察力,小说

语言会变得轻浮;没有想象力,小说语言会变得板滞。洞察力和想象力皆靠细节呈现,而所有的细节均须在小说语言中熔铸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赞赏散文中的某个段落甚为精彩,也可以长久地吟味某首诗中出色的一行,哪怕它其余部分实属庸常,但对于小说而言,只有当它的整体获得成功,局部的精彩才得以成立,否则不过是失败整体中一个脱节小部件而已。从中可以窥出,小说语言是一种整体性的语言,组织严密,构造精巧,而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打着虚构的幌子肆意而为。从这个层面来说,小说语言又是一种最老实、最殷勤的语言,因为它要服从的对象最多:服从结构、服从细节、服从人物、服从对话和场景……在最彻底的服从中把这一切化成它自身。这种服从同时也是一种呼唤、一种引导,在锲而不舍、需要倾注极大耐心和热情的呼唤与引导中,小说逐渐显形,并最终成为语言本身。

有没有一种独属于小说的语言?这个问题近乎谵妄,因为很难设想某一部分语言由小说霸占而诗歌、散文、戏剧绝不能分享,却又引人忍不住地去思考、去探究,因为它关乎文体成立的合理性。对任何文学体裁而言,语言问题皆是兹事体大。高尔基“文学第一要素是语言”的论断,貌似将语言提到了至高位置,实则还未揭示根本。语言并非要素,而是文学存在的家园,是任何一件文学作品得以显形的依托同时又是这显形的全体。以小说而言,明如细节、人物、结构,晦如题旨、寓意、情怀,乃至更难描述和把握的小说气息,都须通过语言抵达并且只能呈现为语言。语言既是小说之体,又是小说之用,它涵括所有,连所谓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也同样经由语言显形。汪曾祺指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是在创作实践中凭借直觉把握到了这一点:小说通过语言显形,并且成为了语言本身。所以,“是否存在独属于小说的语言”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成立。当小说在语言中显形时,阅读